

以西方听得懂的语言,发出中国声音—— 全球气候变化局中的学者使命

潘家华

思想人生⑩

在全球大变局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随着时代浪潮,都是世界化和中国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和见证人。从一个乡土农家孩童一路走向世界高端学术舞台,我有幸在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和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担当学者使命、贡献学术话语,以西方听得懂的语言,发出中国声音,维护发展权益,并在学科建设和发展范式研究方面,躬耕不辍,乐在其中。

执着研究气候经济学,家国情怀

记事之初,因感觉世界之博大,我饥渴读书。1975年高中毕业应征入伍,1977年考上大学,1982年初退役到北京读研究生,1988年求学英伦,求知初心始终。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习型研究,到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创新性探索,再到生态文明发展范式转型经济学的学理叩问,学术路上,求知、求学、求家,凡六十余载,诗意不多,朝向远方,只顾风雨兼程。

父亲的家国情怀,潜移默化我作为学者的使命感。我在剑桥念书及博士后研究期间,不会写作的父亲,总会在家书中让人重复一句:早日学成归来报效国家。1993年,我在完成学业研究后即携妻女回国;2001年底,在完成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评估报告《减缓》卷的工作后,我婉拒挽留而踏上归程,启动气候变化经济学和国际气候治理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教授的国际学术风范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夏振坤研究员厚积薄发的治学教诲,对于我强化英语语言能力、学理基础积累、研究能力提升、学术话语提炼,是标杆和引领,是激励和动力。

1996年访学美国期间,我到纽约大学经济分析研究所交流,所长是一位产业生态学的先驱学者,她告诉我,此研究所系原本在哈佛任教的经济诺奖得主瓦西里·列昂节夫建立。列昂节夫来自前苏联,美国市场取向的主流经济学认为其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是计划经济的工具而不容。这使我意识到,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不仅涉及利益问题,也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可持续发展、全球变暖等议题,在1980年代中后期逐步进入学术研究主流。1988年我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各种演讲、学术交流 and 书刊论文,都围绕这些议题展开。也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在导师的建议下,我将“经济效率与环境可持续力”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多数时间耗在图书馆,对亚当·斯密以降的经典著作,主流学者的环境、资源经济学的理论脉络和方法体系,有了较为全面系

统的学习、梳理和掌握,这也为我从事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学理基础,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方式的熟悉,也为我致力于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关注国家利益维护,以其之矛攻其之盾,以西方听得懂的语言发出中国声音,畅通了前行的道路。

维护国家发展权益,学理公论

世界变局中的中国发展进程,意味着学术话语不可能一成不变,必须基于学理公论加以演绎,才能有效维护国家发展权益,积极拓展国际气候合作。

怎么办?讲公理,析学理。1996年,我进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代表处担任能源与环境项目官员和顾问,开始系统关注能源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1997年《京都议定书》谈判期间,我发表第一篇气候变化经济学论文,随后到荷兰全职参与IPCC减缓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工作。

在参与撰写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期间,我作为秘书处工作人员,不能直接参与论战,但是,我可以写学术论文。面对发达国家效率处方限制发展中国家基本生存排放的情况,我从最基本的公理——人权保障出发撰写观点。

《京都议定书》的排放贸易机制,就是有钱可以买配额,获取排放权。理论上,没有钱买不起配额,就没有排放权。我在研究中,将排放权分为三部分:生存排放,基本公共服务例如医疗教育、社会秩序维系等所需的排放和市场效率属性的排放。生存排放是基本人权,不可以交易;而且,在基本生存排放上,边际减排的社会福利损失无穷大。基本公共服务属于社会公义选择,不是市场主体交易行为。只有市场效率属性的排放,才可以入市交易。此文在英文刊《国际气候协定:政治、法律与经济学》发表后,我受邀参与国际气候公正与碳公平的合作研究。

在气候公正旗帜下,发达国家学者也认同人均趋同理念。英国一家机构提出,发达国家从现在的人均高位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均低位增加,趋一致而实现碳公平。但是,我们分析认为,发达国家人均高位,有大量的碳资产积累,发展中国家人均低位,缺乏历史碳资产积累。人均趋同,实际上并不公平。我们在国际学术论坛、会议上交流这些分析结果,并刊发文章,强调科学理解碳公平。

2000年代中期,中国人均排放已然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再讲碳公平,话语气势趋弱。我们通过分析,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凝聚排放的产品,实际上并没有为中国人所消费,而是转移到发达国家。因而,我们提出转移排放的概念,需要弱化生产侧,强调消费侧核算。多次国际演讲引起了国际知名学者关注,他们主

动提出合作撰写论文,以我为第一作者,在英文刊《牛津经济政策评论》刊发,随后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但即使修正核算方法,中国的碳排放仍然居高不下而且快速攀升。需要演绎新的话语构建,使中国仍然站在道义制高点。我们研究发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是能源服务,并不需要碳。气候公正,不在于碳公平,而在于公平获取发展权。于是,在国际重大场合,我们发声:发展中国家不需要碳,需要的是发展。如果发达国家能够低碳,发展中国家也必然能够低碳发展。因而,发达国家需要率先垂范,从而证明低碳也可以发展,后发国家就可以避免高碳发展。

同时,我领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团队应用西方经济学福利理论的边际分析方法,论证了碳排放的边际福利损失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团队提出,采用人均历史累积碳排放的分配方案。这一方案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全面推出,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德国、印度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碳预算方案。

进入2010年代,零碳可再生能源已经具有市场竞争力。化石能源高安全风险、高污染、高成本,而且碳移除只有投入没有商业收益。此时,我们进一步演绎学术话语,明确提出零碳能源开发利用是高质量发展的机遇,而不是发展的刚性约束。

纵观我从事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发展历程,应该说,我积极参与相关国际平台,从公理学理层面,论述发达国家为什么必须先减排,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必须以发展为要务,解析中国碳排放快速增长的经济学学理性。

服务支撑国家决策,学者使命

了解西方话语构架和表现方式,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脉络和方法体系,归根到底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支撑国家决策。服从国家利益、维护发展权益、代表民族形象,是一学人的责任所在,使命使然。许多政府官员和聚焦于国内问题研究的学者,其话语方式的差异,也或许有语言表述的障碍,使得交流沟通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

身处这变革的时代,不可能置身于世界变局的潮流之外,老一輩言传身教,面对发达国家的强势和西方话语体系的主导,学者就要有担当,需要主动作为。为此,第一要提升原创能力。有原创能力,才能够引领发展,才能有话语地位,才能有定价权。第二要在规则、标准、规范上重塑世界、重塑治理体系。第三要重构话语体系。

我一直倡导构建学理基础扎实、公理共识广泛的学术话语,得到了国际学术界广泛的认可。2008年,国际知名刊物

《全球环境变化》邀请我担任副主编,刊发论文《减缓气候变化的福祉分析》;国际顶级学术刊物《科学》和《自然》邀请我撰写专论。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组织方出版的专刊,用一个整版,刊登我关于基本需求和人权的文章。我关于基本需求、碳公平、发展权、碳预算的概念和分析,对于中国政府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这些西方听得懂的中国话语,有理有据、科学客观,不仅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接受,在2007-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谈判期间,我国一些驻外机构也将我的话表述反馈到国内,受到国内有关部门的认可。

中国是世界的一员。不论面临什么困难,中国学者都需要用国际话语,展现学术担当。不是自说自话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讲中国故事,而是要在国际学术参与中,发出具有学理基础和方法特征的中国声音。全球生态文明转型发展,研究与理论范式的创新和变革,也呼唤中国学者的学理性世界话语。

名家小传



潘家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2006年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组建,应聘为第一届委员,随后任第二、三届委员,第四届担任副主任委员;2010年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组建,应聘为委员;2010年应邀为第十九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202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作为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主笔,参与分享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获颁其专门制作的证书。关于基本需求的学术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后,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一等奖;2009年以第一作者名义合作撰写发表的碳预算论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二等奖(201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2011年)。2014年第一批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计划(万人计划),2017年获中华(宝钢)环境奖。

扫一扫
看视频

对策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我们在改革开放中迎来了发展,在发展中赢得了速度,在发展中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今天,高质量发展,可以说也是决定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我们在继续发展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发展速度上进一步赢得质量,在提升发展质量和推进共同富裕中发达起来,真正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国民经济必须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要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持续增长,同时以稳定的增长支持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必须着力推进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其中,城市尤其是龙头城市,无疑要走在全市前列。

世界文明探源,城市的出现,是文明成形的标志。世界文明发展,城市的发展,是文明成熟的标志。

中华民族复兴,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是文明辉煌的标志。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人民满意的城市需要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一以贯之。这种定力,源于我们对城市历史文脉的敬畏,对城市发展规律的尊重,对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持,对城乡协同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追求。

杭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西湖是一个历史文化名湖。邓小平同志也说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真是个好地方。要把西湖保护好,建设好!”进入新世纪以来,杭州立足于文化自信,在推进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既守正又创新。杭州实施西湖综合保护工程、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工程等,秉承以民为本的理念,全力打造“世纪精品、传世之作”,这是杭州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城市文化高质量发展中的“守正”之举。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把保护好西湖和西溪湿地作为杭州城市发展和治理的鲜明导向,统筹好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布局,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宜居城市方面创造更多经验。

同时,杭州积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全力打造“国际文化创意中心”,每年举办的杭州国际动漫节享誉海内外;在大运河畔,杭州利用工业遗产全力打造博物馆群,使得运河的厚重文脉、城市的深切记忆都能蕴藏其中。这些都应该是杭州推进城市文化高质量发展中的“创新”之举。

杭州的城市文化在“守正”与“创新”交融中,提升了品质,树立了典范。相信在明年亚运会上,杭州作为文化品质之城的禀赋,将在国际上进一步彰显。

高质量发展,需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上不断探索、需要高质量的创新。作为浙江省会城市的杭州,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程中一度辉煌,在中国当代的高质量发展中也应该走在前列,不负昔日辉煌,保持“天堂”荣耀,作出新的贡献,增添新的荣光。

【作者为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基层调研

在推进乡村共同富裕中建功立德

雷永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德作为曾经的浙西政治经济文化重地,如今的“高颜值”山水生态城市,正在打造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上积极探索创新,将乡村共同富裕作为推动共同富裕先行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结合点,努力在浙江奋力实现“两个先行”的征程中先行先试,作出自己的贡献。

以链组党建锻造领军标兵。办好农村的事情,基层党组织必须建强,党员队伍必须过硬。乡村共同富裕需要一批视野开阔、发展能力强的领军标兵。

今年以来,建德聚焦“共同富裕先行”,系统谋划推进“链组建强”,做优全域党建联建,发挥组织优势,通过“链接产业、组织变革、组团发展”,有效激活生产要素,合力助推建德提质、扩中、促低。

乡镇(街道)着力建强基层“头雁”队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推动农村基层党建持续提质增效,带领全体村民在推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党(工)委因势利导,招引科研院所、农技专家、企业大户、金融机构等多元主体上“链”、抱团发展。围绕延链强链补链,“莓链”“莲链”“橘链”等一批特色“共富链组”遍地开花。莲花镇“戴农富”链组通过链接中国农村科贸乡贤徐建龙,试种16种旱水水稻,以优质新品打造卖点;由抓建设进阶为招引社会资本上“链”,打造“网红”引流点31处,其中“十里寿昌江”截至目前累计接待游客11.9万人次,旅游(研学)总收入达985.2万元,“宝藏”风景变“钱景”,乡村共富新路径不断走深走实。

以特色特长激活共富“酵母”。做大共同富裕的“蛋糕”,需要找准那些具有“酵母”效应的关键变量。

依托生态、美丽“升级”。下渚湖之江片区下渚、江、江湾、联和、马目、施家六村沿生态连线,着力布局美丽经济特色业态,探索出一条以乡村美带动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径。如之江村发展出的“镜头”经济学,做大“摄影+文旅”文章,尽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魅力。

数字赋能,系统重塑。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共富提供了新动力,带来了普惠性增长。近年来,建德全面推进农业生产、乡村

【作者为建德市委书记】

加快打造新时代数字文化产业新高地

袁晨枫

前面临新风口、进入关键期,迫切需要挂图作战,创新实干,久久为功,拿出成果。

聚焦未来所向先行闯关探路。尽管浙江对文化产业数字化作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但对新业态发展的顶层政策设计还不够。聚焦“国家数字文化创新基地”目标,聚合资源以更高站位谋划推进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制定顺应时代要求、具有浙江特色的规划政策,为数字文化产业绘制新蓝图、构建新格局。

坚持大项目带动大发展

加快打造新时代数字文化产业新高地,必须立足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具魅力的人文气质,找准牵一发动全身的项目举措。

打造国家级大平台。充分发挥中国(之江)视听创新创业基地、杭州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等高能级平台落户浙江优势,持续带动浙江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主动对接融入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国家战略,找准发展机遇和着力点。放大中国国际动漫节、中国国际网络文化博览会品牌效应,拓展在线动漫平台规模和盈利空间。

推进引领性大工程。加快推进之江文化产业带等重大工程建设,不断扩大其引领和辐射作用。持续抓好中国网络作家村、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等重大项目,建好数字文化产业核心区“之江发展核”,让企业和项目真落地、见实效,不断提升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层次水平。深入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加强与宋韵文化具有鲜明浙江辨识度的数字建设标识。推动文化项目“走出去”。发挥互联

网优势,支持数字文化企业打造一批体现中华文化内涵、国际合作成效与示范带动效应好的文化项目,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企业或机构合作开发生产适宜沿线国家文化需求、贴近当地市场的优质文化产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学会中国故事的国际化表达,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

坚持大融合推动大跃升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发展,文化消费新场景不断解锁,新业态不断催生,数字文化资源规模化、集成化进程提速,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动力强劲。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已不再是“选择题”,而是“必修课”。

从我国现状看,数字文化产业规模持续壮大。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中,数字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9623亿元。既要顺应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趋势,改造提升我省传统业态,促进文化产业“上云用数赋智”,促进数字文化消费升级;又要推动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引导线上用户到实地游览、线下消费,推动传统业态不断改造提升。

从浙江发展看,文化产业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2020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4495亿元,是2012年的2.8倍,其中数字文化占到全省文化产业总体量的50%以上。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内容、技术、模式、业态和场景创新。坚持深化“互联网+”“文化+”,做大做强数字阅读,推动游戏、网络文学、电竞等新兴产业,推出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拓展新蓝海。

实践探索

对文化产业而言,抓住了数字文化产业,就抓住了高质量发展的未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当前,浙江既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又要对标先进、走在前列,加快打造新时代数字文化产业新高地,为我省“两个先行”注入强大文化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浙江数字文化新篇章。

坚持大视野谋划大格局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发生了巨大的结构变迁,正步入以数字文化产业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这就要求数字文化产业要紧紧融入党委政府工作的全过程、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的各方面,加快形成以文化力量推动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新格局。

聚焦国家所需明确目标方向。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出台《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1年“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被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今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数字文化产业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对新兴的数字文化产业作出的顶层设计,为引导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聚焦浙江所能系统谋划推动。文化产业是浙江重点培育的万亿级产业之一。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打造国家数字文化创新基地。数字文化产业作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当